

薪火相传：政治学者的初心使命*

燕继荣**

北大政治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始。120 年的学科发展史，需要从头到脚地梳理清楚，打理得利利落落。

今天是钱端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大家从不同角度解读钱先生。比方师承说、双重说、焦虑说、执行说（理论说）、交往说等等，我想从政治学学科特点和学术延续上来发表一点感想。

钱先生是一代人的代表。“钱先生们”的议题，哪些实现了，哪些还没有实现？那些没有实现的议题，在今天变成了什么性质的问题，具有了什么新的意境？

本来提供的题目是“薪火相传：北大政治学者的使命”。我这里说的“北大政治学者”，也不完全是工作在北大的学者们，“北大学者”是一个概念，一个“群像”，指的是一批具有某种共同观念的知识分子，用许纪霖教授的说法是指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延续了一直以来的精神，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国家主义”、忧国忧民、为国家焦虑。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逐渐减少，他们的声音或许会成为最后的“绝唱”，现在为国家焦虑的人不多了，为个人焦虑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了。

听了一天大家（是“大家”的大家，不是“大众”的大家）的发言，我

* 本文据作者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觉得我修改一下主题：“薪火相传：中国政治学者的初心使命”，这个或许更加贴切。

今天的讨论会学到不少。第一，政治学者比较长寿。钱先生是政治学教授，他的老师何尔康先生年寿 93 岁，钱端升先生本人年寿 90 岁，钱先生的同学同辈萧公权先生年寿 84 岁、浦薛风先生年寿 84 岁、罗隆基先生年寿 69 岁。钱先生的知名弟子不少，他的学生王铁崖先生年寿 90 岁，龚祥瑞先生年寿 85 岁，张奚若先生年寿 84 岁，赵宝煦先生年寿 90 岁。

学习政治学的人都比较长寿。所以，我们都有长寿希望。为什么政治学教授能长寿，估计至少有三点原因：一是心态，有理想，生活还好，心态不错。二是心愿，有理想者，喜欢跟现实较劲，改变不了现实，也有一种亲历见证时事变迁之结果的心愿和心结。执拗于相信时局一定会如我所料，但现实是，有时候时局不断变化，有时候变化需要等候较长时间，而且不顺心的事情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于是至死不渝，“死不瞑目”。三是政治学教授审时度势，对险峻的政治形势有一定判断，有较好的避险能力。

第二，正如钱先生一样，许多政治学者既有学人风范，还有士人情怀。政治学人都具有双重人格（说是人格分裂，也属正常）。钱先生既是政治学者，又是政治评论者。今天中国的很多学者不仅像“钱先生们”一样有双重身份，直接转为政府官员的也越来越多，甚至索性都不用转型，就被说成是“体制内学者”了。这种状况与这个学科的属性相关。政治学科是经世致用之学，这个性质决定了政治学执业者的特点。

政治学尤其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也是政治学科的要求。上午提到学术界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别、“学人”与“士人”的不同，这种认识和划分正好能够很好地说明政治学者的职业特点。

人们认同政治和政治科学的分野，而政治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一个争论。那些主张政治学是科学的人，都强调实证研究、科学分析，最终导致了政治学研究的制度主义和行政主义的倾向。那些主张政治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的人，都强调政治的价值导向、能力导向、行为导向和结果导向，这些导向最终导致了政治学研究的政策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倾向。

我不想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也不想说“帝王师”的想法和做法就偏

离了政治学大船行驶的“航道”。我只是想说，有志于做一个“政治学者”的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保持中国政治学术的延续传承，而这个学科的“魂”其实就是家国天下的情怀。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北大政治学要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继续号召志同道合者，建立学术共同体，一起来梳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史，目的是要梳理政治学的初心使命，唤起年青一代学者去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只是论文发表机器。这一点刚才徐湘林教授已经阐释过了。

传承北大政治学学科精神，这是北大政治学者的使命。薪火相传，传什么？就是政治学者的初心。中国政治学者的初心在钱先生的身上能够找到。钱端升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端人物，他的思想反映了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初心。上午分析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下午刚升教授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政治学人的初心。显然，钱先生的解读有不同的路径，比方，我们在讨论中提到，是回到钱端升，还是反思钱端升？“理解世界”的钱端升，还是“构建世界”的钱端升？这些表达我都非常认同。

另外，我们不仅要传承接续，还要创新。中国政治学者还有重要的使命，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说到创新，就是要创新议题、创新研究、创新观点，形成理论创新。那么，今天的创新在哪？这需要的就是罗伟楠老师提到的反思钱端升的思考。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1) 京师大学堂：官办官学。

(2) 民国时期：政治学建立，诸种思想兼容并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列。钱端升先生在这个时期代表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那个时候大家统一在国家兴起的重大话题之下，中国问题的研究思想活跃，人才辈出。

(3) 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政治建设，百废待兴，宪法制度成为急需。之后阶级斗争等运动的无限制扩大化，把政治学变成了斗争的工具、宣传的手段。

(4)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生活回归常轨，政治学恢复，并为恢复政治正常秩序，融入国际社会，实现经济起飞提供论证。

今天，我们抱有家国天下情怀的政治学人，面临什么议题的选择？

(1) 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意志的执行。

(2) 现代国家构建/现代国家发展：国家独立——国家统一/国家发展——政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3) 制度的合法性/制度的效能性：制度供给/制度执行。

多个议题多种研究路径选择。不管怎样，当今时代，国家现代化（现代国家构建及其治理）、世界新全球化（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两大议题摆在面前，需要我们政治学学者去解答。

最后我再说两点，算是会议总结：第一，一个大学、一种学术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传承思想，使之成为文化；接续话语，使之保持代际沟通。大学的学术功能发挥得不好，会出现历史、文化、话语的断裂，进而产生政治和政策的断裂，严重地说，会产生社会横向和纵向的分裂（地域分裂和代际分裂）。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钱先生 120 周年诞辰，并以此为契机，来研讨他们那个时候的故事、那个时候的话题、和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要保持思想的连续性，就是在实现大学的功能。

第二，我们今天的纪念研讨会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模式，我们希望北大政治学系以后有组织地持续地组办这样的学术历史研讨会，以钱端升先生的纪念会为开始，陆续整理北大政治学前辈们的思想，使之不仅展现在图书资料中，更成为“北大之精神”。